

陝縣
文史資料

第三輯

政協河南省陝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陕 县 文 史 资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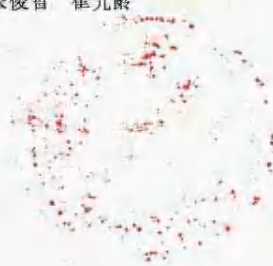
第 三 辑

135/35

政协陕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 蔡恩义
顾问 翁荣声 张耀汉 张涛
主编 李松亭
编辑 张俊哲 崔九龄



陕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三门峡水电十一局印刷厂

1991年2月

目 录

周总理视察大营农业社·····	陈作玺
和平书店·····	杨静峰
大营会议与急性土改·····	刘全生
欧阳珍杀害陈顺山的内幕及经过·····	刘全生
我在“老八师”43团话剧队的亲历·····	吕志远
侵华日军在陕县的暴行·····	杨智忠
甘棠东进	
————韩复榘在陕州叛冯投蒋经过及原因·····	刘全生
欧阳珍主陕二三事·····	野 斐
原陕州《崤函日报》·····	刘全生
黄河第一个水文站创建始末·····	何康民
旱灾引起的一次农民抗粮斗争·····	孟裕民
原陕州城旧貌图及说明·····	张俊哲
回忆1946年陕湍划界·····	孟裕民
我记忆中的陕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	张品三
国民党时期十一区、陕县地方行政	
训练班、所情况简介·····	宋贵旺
庙道在陕县始末·····	杨崇发
中国新事业建设协会陕县分会简介·····	张俊哲
国民党陕县党部流亡时期吸收党员之谜·····	孟裕民
国民党统治时期陕县军政间倾轧事例三则·····	孟裕民

建国后陕县农业自然灾害概况·····	张俊哲
我对陕州的回忆·····	乔紫亭
回忆陕州的银号、银行、通行货币及往来·····	乔紫亭
1935年至解放初期陕州市场工业、手工业·····	乔紫亭
民国时期陕县境内部份金融机构及其业务·····	郑史办
解放后陕县黄金、白银的收兑和管理·····	郑史办
民国时期的高利贷·····	郑史办
孙殿英陕州轶事·····	张俊哲
“老洋人”过陕州·····	郑史办
国民党陕县政府官职表·····	张俊哲
上村刘娘娘·····	杨智忠 张俊哲
陈简其人·····	陈作玺
陕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稿简则	
及征集文史资料参考提纲·····	文史资料委员会

周总理视察陕县大营农业社

陈 作 玺

195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偕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共中央委员、河南省省长吴芝圃、以及陕西省、山西省负责同志等20余人，视察了陕县大营农业社。

周恩来同志是1958年4月21日来到三门峡市的，当天上午视察了三门峡工地。下午，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主持召开了有河南、山西、陕西省负责同志及有关水利专家参加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会议。会议期间（24日下午）专程到大营农业社进行访问。陪同周总理参观访问的陕县各级领导人有：县委书记郝玉江、副县长张同昌、公安局长张修德、大营乡党委书记张寿喜、大营农业社社长陈启生等。

大营是有名的棉乡，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都比较好，是全县和全省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周总理和彭副总理一行于4月24日下午1点到达大营车站，下火车后就到田间视察，先后查看了大营的棉田、麦田、青年队试验田，水库工地，进村以后，又访问了社员家庭，大营街的卫生所、书店、社办小工厂等单位，和许多干部、农民、青年、妇女、营业员、小学教师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历经三个多小时。

周总理访问大营期间，正处在整风、反右斗争之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夕，党内“左”倾思想已有所发展，“大跃进”的势头已经兴起。但是，周总理和彭副总理在视察访问中，仍然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保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粮食、棉花的产量，并不追求高指标，而是多方询问他们增产的科学依据。当社长陈启生汇报了他

们的棉花计划产量后，总理没有表示是高或是低，而是问他们的增产措施是什么。陈启生讲了他们打算如何浇水，如何施肥，如何细致耕作后，总理笑笑表示满意。到麦田视察时，总理问陈启生：“你们今年的麦子打算增产多少？”陈启生答：“全社平均亩产650斤”，总理让别人抽一个麦穗看看有多少粒后说：“一亩是120万株，这样再平均一下，每亩好麦便可以收获1000斤以上。”

周总理非常注重实地调查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听汇报。在棉田里，看见一个社员在剔棉花苗，总理就问如何剔苗。并蹲下试验着剔了几棵苗。当发现有些棉花叶子发黄时，便关心地问陈启生为什么有的发黄，种上多少天了，是什么品种，了解的十分详细。当看到麦地里露出的坟时，便问陈启生：“坟多不多？”，陈启生回答：“转高级社时集中了，全社的坟集中在15亩地里”总理又问：“说得通吗？老年人满意吗？”陈说：“老年人都满意，老坟没有动，也没有平掉，只是新坟地集中了。”周总理赞许地说：“现在照你们的办法好”。总理和乡党委书记张寿喜交谈时，张介绍说，这里是十年九旱，水源不足。总理问：“那老百姓吃水咋办？”张解释说是打井搅水，井有三、四十米深。总理说：“你们可以打井灌田，用机械用电嘛！”又指出还可以修水库，搞水土保持。到水库工地后，人们让总理在沟上边看看，总理一定要到沟下边去看，当看到有许多青年妇女也在那里打夯时，总理便亲切地上前问候，问夯有多重，干有多少天了，对她们进行热情鼓励，并亲自拿起小铁杵夯了几下。那一年，总理已六十高龄，还亲自参加劳动，使在场的干部群众都十分感动。

周总理十分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田间参观时，总理多次嘱咐随行人员要当心，不要踩坏庄稼苗，访问中对社员的收入和社里的公共积累都十分关心。他问陈启生：“全社去年收入多少？社里的公积金有多少？”陈启生回答：“社员人均收入126.8元，社里公积金15万元”。总理又问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在全省算是收入最高的社吧？”吴答：“是最高的”，总理满意地点点头。

在视察中，周总理还访问了几户社员家庭，每到一家，都要问问

粮食够吃不够吃，并亲自看看面缸、水缸。在朱素妙老大娘家，他亲切地和老大娘屈膝谈心，在访问中碰到两个小学教师，就亲切地询问他们是那个学校的，学校房子够用吗？儿童都入学了吗？并说：“当教师是光荣的，群众会尊敬你们的”。

周总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参观访问中，无论遇到什么人，都热情接待，和干部群众谈笑风生、态度和蔼，非常亲切，凡是和周总理会见、交谈过的人都感到无拘无束，心情十分激动。他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还和有的握了手。在水库工地上，陈启生请总理给水库起个名子，周总理就亲笔题写了“胜利水库”四个字，并说：“祝你们胜利！”回到乡政府后，有些干部提出让总理给签个名，总理愉快地接受了要求，并主动提出和县、乡、社负责干部合影留念。当周总理离开大营社的时候，许多社员和小学生跑到车站欢送，周总理亲切的对大家说：“你们回去吧，要好好生产，好好学习”。

周总理访问大营农业社这个喜讯，通过当时的报纸、广播迅速传遍全县，乃至全省、全国。这不但是大营人民的骄傲，也是全县人民的光荣。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生产，当年就取得农业好收成。尤其是大营村，1958年棉花总产达162万斤，单产180斤，粮食总产280万斤，人平456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同年12月，陈启生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还记着大营社，邀请陈启生和部分劳模到中南海作客，共进午餐，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陕县和全国人民一样以最深沉的悲痛悼念周总理。1月15日，陕县县直机关和大营公社的干部群众一万余人，在周总理生前视察过的大营村南“胜利水库”旁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陕县人民更加怀念周总理。1977年4月，在纪念周总理视察大营十九周年之际，大营群众要求自愿筹资，修建周总理视察纪念馆。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县财政拨款二万元），纪念馆开始破土动工，于1977

年9月胜利竣工。纪念馆位于大营村中心，占地236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平方米，投资76000元。纪念馆有展厅11间，厅内展出周总理视察大营时的巨幅照片和一些实物。周总理视察纪念馆建成十多年来，共接待参观的干部群众约八万余人次，其中还有许多外宾，如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日本学生代表团，日本农业水利访问团、西德教师访华团，法国东方之友九团等。现在，周总理视察纪念馆已成为大营村的宣传教育阵地和陕县新开辟的旅游点。

（本文作者陈作玺，陕县西张村乡陈村人，现任陕县党史资料征集编办公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和平书店

杨静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向同盟国宣布投降了。这是多么令人舒畅、精神振奋而神态飘然啊！人们带着喜悦的眼泪奔走相告。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呀！不久，我和父亲等家人就重返乡土了。八路军已渡河北去，乡官们忙于复旧，商店都在整顿重新开张，颇有一番劫后新生的景象。正当人们欢庆胜利，兴致勃勃之际，连续传来了使人不安的消息，劫（接）收大员，为非作歹，刮民党军进犯解放区有增无己，和平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内战烈火，又迫在眉睫，然而人民对和平的要求愿望都是很强烈的。我经过反复思考，感到斗争方长，势难坐待，就选择了开书店这一行，一则可以有个固定职业，固定地点，以便于隐蔽和组织联系，二则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些有益的工作。决心定了之后，就考虑书店的名称，一不能使人望而生畏，引起麻烦；二不能平庸陈腐，缺乏战斗气味，三必须符合党和人民的愿望。因此，就定名“和平书店”。就字面上讲，是无法加以罪名的。实际的含义则是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的。我于是联系亲友，筹集股金，每股五元，只筹集了近百元，父亲又给了几十元，订购书刊，先是只摆个书摊，又找了本街两个青年伙计。后来又找了家中一所市房，两间门口，一个小院，借了家俱，就正式挂上书店的牌子。

在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的这场战斗中，广大民主人士和我党是一致的。许多书刊也都是民主人士出面办的。国民党虽然也痛恨民主人士，迫害民主人士，但他们的书刊是无法禁止的。那时火车尚未恢复通车，一位民盟人士路过书店徘徊不去。我就请他到书店休息，言谈

之后，我就请他烦请黄炎培先生为书店书写一个牌子，后来他果然寄来了“和平书店”四个大字并有落款。我高兴地挂起来了。我幻想：如果国民党把我作为与民主人士有牵连，或者还不至于封闭书店。为了解决书店人员的生活，书店还经营文具和小学课本并代销了几种报纸。值得一提的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秦风工商日报》，这是陕西省一位有名的民主人士在西安出版的。书店代销了三十份，常以李代桃的办法送给订户。在西安特务蛮横压制下，坚贞不屈，义正辞严，仍刊登大骂特务的新闻和文笔，实在令人敬佩。可惜终于因遭匪徒封闭而停刊，不过这只是敌人在灭亡前的疯狂挣扎而已，书店还代销有《大公报》，最后为了伪装一下，还代销了伪《中央日报》。

县简师校长是我的上班同学，他猜测到我的身份，和我的关系是不即不离。一天，他来到书店后房，秘密地对我说他们的学校缺乏生气，希望我给他介绍一个语文教师，以打破沉闷气氛。我笑着说：“别开玩笑，我哪里会有这样的人才。”但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不在组织，思想进步就好”，虽然我再三说我是卖书的，无能为力，但他却是不信。临走的时候，他仍然那样肯定。我想他不会来麻烦的，虽然我是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师，但为了青年，为了不失掉这一难得的机会，一连几天我都在思索着。一天，我和书店杨先明同志与本街住的青年李德显在一起闲谈，我无意中提到能否找到一位能胜任师范语文的教师，德显同志立即表示他可以担当，我高兴极了，就决定介绍他前去。

德显同志是巩县人，和杨先明同志在国立十中同学。经常到书店来，思想进步，正派大方，他能胜任该是多好呀！卫清华同志正好也在师范任体育教师，他们俩在一起，就可成为共产党在师范的一个据点。后来，他们秘密地为书店销售新书刊，不便销售的就让他们借给同学传阅。四七年解放后，李改名李尉到了部队，我们知道后，迈伦同志又从部队要回来作为陕县一区村区长，现在李在四川军区任宣传部长。卫清华同志解放后任小学校长，不幸受了冤屈，听说尚未得到平反。（编者注：已平反）

书店成立不久，原灵宝县地下共产党员张羽同志（解放后任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地方无法存身，前往上海路过陕县时，他为我介绍了陕县邮局王世卿同志（现在郑州邮局）。王原是地下共产党员，为了避免特务检查书刊，书店一些进步书刊，许多是由王直接送到书店的。记得还在战火爆发之前，书店曾向北平《天下出版社》订购书刊，好久不见消息，后来寄来了两包马来西亚出版的共产党书籍，就是他送给我们的，如果被特务检去，必然要出大问题的。

和平书店吸引了一些正直的文化人士，本来是伪专署喉舌的《民声日报》，可是它的总编辑贺耀天（沁池人，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员，后被伪专署撤消总编辑职务。解放后，任陕中教导主任、副校长）。编辑李树滋（灵宝人，解放后任陕县文化馆长、副县长等）。李浩之（山西人，现任山西大学副教授）以及校对等人。都经常来书店作客，我们很谈得来。原来我们并不相识，逐渐对形势分析有了一致见解，倒都成了知友，他们曾对我表示：“我们这个报纸，除中央社发的新闻外，绝不在副刊上刊登责骂共产党的文章，我们虽然相识不久，但却是心心相印的。

在我下届的一位初中同学李本群，当时是陕县的伪社会科长，此人为人正派，留心国事，他经常到书店来和我谈论民主人士中的文人学者，在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章乃器、费孝通等，他都很赞赏，他是陕县国民党中一位有见识的人。在风雨侵袭的困难时期，他毅然向我提出：“挂上社会服务处的牌子，就说是我们办的。”可见他是多么热心地支持。

约在四六年的上半年，狄俊民同志从书店出发乘火车秘密到山西解放区会见迈轮同志，此后组织又派部队张克敬同志化装前来，除传达当时的形势外并让我特别注意保护自己。另外张永周同志从延安回来，又从迈轮同志处前来，也为我传达了形势。这个时候，我感到精神振奋，心情开阔，已经消失了孤独之感，似乎已不大在意恶劣环境的威胁，四七年春，赵群一派新安县的一位农民同志到书店来，他没有带任何片纸介绍，只说了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暗号，他不提出我也早已忘掉

了。我相信他是真的，亲切地接待了他，他转达赵的意见说：我军准备渡河南进，陕县河防的几个渡口上，敌人兵力的人数、番号、武器、设防工程等都要调查清楚向组织汇报。我久久盼望的消息，看来不久就要实现了。我请他先在我家中住下，再想办法了解。他表示，他县来了许多人修城墙，他和他们住在一起较好，一星期后再来。他走以后，我反复思考，想了几个人，有县军事科的，有县三青团的，最后想到县党部的赵建昌，他和群一同志还有叔伯兄弟之情，就说是群一同志派人要他了解的，建昌同志原为地下党员，我以组织名义严肃地要求他在一周内完成了解任务。他有工作便利的条件，一周以后按时间把情况详细告诉了我，我作了详细记录，并一一告诉了来的同志，可是那位同志并不肯带材料，说他的脑子都记下了，我虽然不敢相信，为了安全也只得由他。文革中，听批判者说，这个老头还在。

约在四七年春天，伪三十八集团军开到陕县来了，一时风云突变，妖雾弥漫。他们特工人员到街上一走，便声言《和平书店》有问题，这些家伙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只不过看到在大城市中早已陈列出售的几本新书而已，这说明他们已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他们有几个特工人员，住在一家商店后面的五间上房内，明礼的叔父也住券后面窑洞内，明礼在他叔父家中暂住，大概以伪县参议员的身份和那些人就攀谈起来，据谈，那些人是专做特务工作的，而且认为和平书店有问题，他虽然向他们作了解释，但随时都有危险性，我却平静地说：有什么问题，不过想找事就是了，不料竟激怒了这位显赫乡里的参议员先生，竟至出言不逊，以致大吵了一场。随后，我就把他们夫妻二人入股的十元钱送交了他，并表示：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牵连他们。

我知道，明礼对我是出于爱护之情，但他无能责怪敌人的嚣张气焰，却错把气出在我身上了。他大概忌这一危言耸听，就把我吓住了，不过我也是经过一点风浪的。虽然如此，我也并不安心，适有三十八集团军一位军官，看样子不象是个芝麻官，他常来书店看书并订一份《大公报》。我看他不象特工人员，就请他到后屋坐，先表示

我们不懂开书店卖什么书，请他指出那些书是禁卖的，以便清除。他却表示：“我都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参谋长曾问过我关于你们书店的情况，我已告诉他没有问题，你不要担心”。我请他以后多加指导帮助，他说：“以后有什么情况，我再告诉你。不过我们这里没问题，是你县里人找你麻烦。”我假装惊奇，自言自语地说：“县里谁呀”？我看看他，表示怀疑。他说：“我也不便告诉你”。我于是扯起了陕县文化事业，实在可怜得很，我们的书店不过是从西安购进几本书，仅仅较之三青团办的青年书店，不大相同而已。他告诉我：“正是三青团的干事长找你麻烦的，你可不要对别人说”。我当然答应，并表示感谢。

那位干事长和我是相识的，虽不往来，路遇也还寒暄两句，他找我的麻烦，我是早就听说过的，这次他又想借三八集团军之手加害于我，我相信这一消息是确实的。

据悉，那位干事长曾在一次汇报会上提出：和平书店有问题，会议决定由国民党县党部和三青团联合组织调查，调查人由党部干事赵建昌和三青团股长吕志远率领。这两位原都是共产党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让我作好准备。他们率领四、五人，装作上街游玩的样子，路过书店进去打个哈哈就走了。因为多是相识的，大家面面相觑，领队的不动手，其他怎好翻箱倒柜呢？象这样的检查，不多几天就来一次，每次检查的前一天，赵、吕两位都装作路过书店去给我打招呼。一次我进城路过青年书店，因为都相识，就进去浏览一下，看见摆着一本《中央周刊》既陈旧又破烂，不知已经过多少年月，我就要了去，来应付检查。这样的检查虽然不关痛痒，但已作为他们的对象，反动派并不是根据证据来行动的，一旦到了狗急跳墙的时候，很可能要下毒手。

在形势比较严重的日子里，有一天，赵建昌到书店来，他带着关切的心情对我说：“现在形势很不好，你要想个法子”。我问他：“你有什么什么办法？”他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说：“在南关商人中，有个国民党小组，负责人就是皮货铺掌柜赵涌合，我把你编到他的小组，

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你了”。我立即说：“不行，我又不是国民党党员，怎么能够冒然去参加人家的小组呢？要是被人家发现，连你也要受到牵连”。他以县党部的权势说：“没关系，他们哪里知道你有什么人，一切由我负责，你不必顾虑”。我想他是好心，不过是捣国民党的蛋，就表示同意，并自己暗想，在这种时刻，国民党很可能要捕人，它的基层组织可能要提供姓名和线索，我就可以透露消息来保护这些人，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一天上午，我参加了小组会，大约一共有五、六个人，都是商店经理一类人物，大家整襟而坐，负责人开门见山地说：上边通知为某害死者捐款，每人一元。宣布后，大家当场交了钱。我说没有带钱，随后补交。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过了多天，我又第二次参加，负责人读了一段三民主义，大家说了些闲话就散了，这两次小组会，都不涉及当前形势。从此，我也就没有再去参加过。……

四七年八月陕县临解放前，吕志远同志告诉我，要我躲一躲。他的干事长在专署开会，已经研究先杀害我和尤继贤的弟弟。我因此就藏在家中后面的窑洞内，几天没有上街和到书店去。那时候，正是敌人仓惶准备逃跑的时候，没有顾得下手，如果再晚解放几天，恐怕我已看不到这胜利的日子了。

当解放的炮声隆隆打响时，敌人都龟缩在城内，南关已成为解放军的前哨阵地，父亲坐在室内听着炮声，写了八个大字：“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他老人家已经七十多岁了，看清了历史兴亡的这一道理。

陕县解放了，迈伦同志尚未到达，但已确定了我的工作。第二天一早还是曾来书店那位部队同志就来找我一同进城了。

（本文作者杨静峰，男，陕县南关人，解放前曾任中共陕县县委宣传部长等职，解放后任洛阳林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后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87年逝世。）

大营会议与急性土改

刘全生

1947年9月13日至20日，陈赓兵团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前委）在陕县大营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的群众运动，便在灵宝、陕县、卢氏、阌乡等县由点到面展开，一时出现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混乱局面，使豫西地区的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这就是1947年后期发生在陕州地区的重大事件——急性土改。

（一）

1947年秋，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陈谢大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歼灭国民党军队四万余人，创建了豫陕鄂根据地。当时建立的中共陕县县委、陕县民主政府和陕县县大队，即隶属于豫陕鄂一地委、一专署和一分区。

豫陕鄂地区多山多沟，地瘠民贫。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封建势力剥削压迫，并不断受到土匪烧杀抢掠的人民群众，长年劳动，不得一饱，迫切要求解放。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使群众对共产党半信半疑。担心解放军站不住脚，扎不下根；怕解放军走了旧势力回来报复。加之周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和土顽武装不断扰乱，给群众心理造成了很大威胁。

为了在豫陕鄂地区迅速建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改变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为我党、我军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后方，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赓兵团前委和豫陕鄂区党委决定在解放了的广大地区，开展一场以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改运动。

陕县、灵宝、卢氏、阌乡等县的急性土改，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二）

大营会议是陈赓兵团前委在豫陕鄂一地委辖区部署急性土改的第一次会议，也是一次紧急的动员会和点火会。

1947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了灵宝县城，陈谢大军主力正在回师东向，对陕州之敌实行迂回包围。就在这紧张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兵团前委以另一套班子，在陕县大营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从9月13日开始，历时7天。参加的人员有陈赓兵团政治委员兼前委副书记谢富治、前委委员裴孟飞、孙定国、韩钧、宋烈，陕县、灵宝、阌乡三县的县委负责人，还有从太岳、太行随军进驻豫西参加土改的五个干部大队负责人，共30余人。会议地点在大营村窑里上院（时为太岳区公所）。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作了简要的讲话，他说：“现在嘛，就是同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就像那个样子，就那样搞。谁家在地主，那很简单，看谁家的房子好，门前拴着大骡大马，不用问，他就是地主，反正搞他就是了……”。接着，裴孟飞代表前委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放手点火，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解决一切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说：“这一把火如不能迅速地点燃，根据地就建立不起来，继续打胜仗也就成了问题。从战争胜负来说，土改成了最基本的任务。……因此，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是点火者，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松点火工作。不仅在军事局面打开后或战争空隙中要集中全力进行点火工作，就是在参战中或随军转移中，也要注意点火工作。……在变为游击区的地方，也要一手持枪，一手点火。总之，要有一个放手点火的精神。”

裴孟飞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1、放手点火，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相反，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农民与地主没有撕破脸